

但汉松:在学院之外为好的阅读振臂一呼



但汉松,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更多人熟悉他,是拥有50万粉丝的微博大V“洛之秋”,他常在网上和读者讨论外国文学及翻译。

在“知乎”一则名为“南大有哪些有趣的老师”的问题下,但汉松的名字位居前列。有人这么描述他:“不仅语言能力强悍而且文学批评做得很好,个人口味偏向诸如霍桑、品钦这些美国人看起来都头疼的作家。”近年来,但汉松频频受邀出现在南京各大书店,进行西方文化文学新书的阅读推广,也曾出版书评集《以读攻读》,对英美文学、电影戏剧、当代中国小说进行精妙细致的评点剖析,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和书评写作,在这个文学阅读日益速食化的时代,在学院之外为“好的阅读”振臂一呼。

事实上,但汉松还是国内最早开展9·11文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最近,他以《跨越“归零地”:21世纪美国小说研究》为书名,将自己多年来研究9·11文学的学术成果集结推出,以争鸣姿态与国外学术界进行对话。本书以9·11事件为宏大问题域的中心点,远溯历史,超越国界,介入当下,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虽是学术书,对于想要了解西方文化思想、文艺理论的普通读者来说,也颇值得一读。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文
牛华新/摄



《跨越归零地》但汉松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

好的9·11文学深刻诠释为“命运共同体”

读品:你的专著《跨越归零地》聚焦与9·11事件相伴而生的9·11创伤书写,为什么对9·11文学感兴趣?国内相关研究现状如何?

但汉松:我的专业方向是现当代英美文学研究,9·11文学又是美国当代文学中特别突出的一个文学类型和现象,同时它又与晚近的国际政治和历史密切相关,并且这些作品尚未得到充分的评价和阐释,还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不管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可以平等地去观察、去介入这个研究领域。国内的相关研究和国外差不多同步,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的《当代外国文学》十多年前就开辟了“9·11小说研究”专栏,我最早的一篇相关论文就是发在这里。9·11文学可以说是当代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领域,在国家和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里面,都有专门研究9·11诗歌、9·11戏剧和9·11小说的。

读品:美国作家们是如何反映9·11事件的?

但汉松:9·11之后,反恐成为美国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其后不久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拉开了所谓“全球反恐战争”的大幕,也让美国陷入了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战争,甚至比越战耗时更长。对美国人来说,9·11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其影响不亚于“珍珠港事件”。

因此,当时的美国作家都有一种使命感,要以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去回应、去阐释这个事件。梅尔维尔写了《白鲸》,菲茨杰拉德写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当代美国小说家要写什么才能最深刻地关照这个时代?9·11是绕不开的。这个执念,其实牵引了美国作家相当长的时间。早期的9·11小说通常关注个体在暴力恐怖袭击之后的心灵修复,让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断裂处学会去感恩生活、感恩上帝。

2007年前后,美国爆炸性地出现了一批更为严肃且成熟的9·11小说,如唐·德里罗的《坠落的人》(2007)、科马克·麦卡锡的《路》(2006)、约翰·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2006)和科伦·麦凯恩的《转吧,这伟大的世界》(2009),等等。美国作家此时终于获得了一种距离感,可以更好地去观察、再现、审思这样一个重大事件。这些小说不再是简单地围绕心灵修复展开,而是更多地引入了“他者”的视角;同时,也不再局限于曼哈顿一时一地,而是把故事投射到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等地。可以说,美国文学此时真正找到

了以文学再现9·11的方式,作家们有意识地之前那种温情的家庭叙事或者是激荡的爱国主义叙事拉开距离,不再只是去讲美国人如何受到无妄的伤害,不再只是迎合爱国主义或宗教情怀,也不再去作简单化的道德评判,而是把叙事带入到复杂的、暧昧的伦理空间中去加以呈现。正如德里罗所说,真正的9·11小说提供了一种“反叙事”——让读者发现,对于9·11这样的事件可以有极为斑驳的多重理解,它有着我们在电视媒体上看不到的另外一面。读这些作品,你会发现,它们不但超越了美国中心主义、美国例外论,而且容纳了更为多元异质的声音,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9·11到底是什么。

读品:9·11事件又是如何影响了世界文学的?

但汉松:事实上,从一开始9·11就进入了世界文学。第一部有影响的9·11小说,并不是美国人写的,而是法国作家弗雷德里克·博格比德写的《世界之窗》(Windows on the World, 2003)。甚至在亚洲,也能感觉到9·11余波的影响。村上春树的一系列作品,对此都有或明或暗的影射,《刺杀骑士团长》(1084)都有跟恐怖分子有关的情节。虽然村上春树可能写的是日本五六十年代的左翼激进团体,但这些故事在本质上与9·11文学叙事是相通的。9·11之后,中国也有一些这样的作品,譬如上海作家小白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封锁》,里面体现了较为鲜明的9·11文学的问题意识,尽管他的故事框架是抗日谍战题材。所以,我想9·11是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世界文学,它也不可能不影响世界文学,因为它是如此深刻地定义了9·11之后的整个世界。

读品:立足于国际政治现实的大背景,你认为国内开展9·11文学相关研究有何现实的意义呢?这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何价值和启示?

但汉松:可以说,我们已经无法彻底跳出9·11来看今日之世界——反恐战争、“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伦敦恐怖袭击、棱镜计划、叙利亚内战、欧洲难民危机等等,无不直接或间接地源于星期2的那次事件。这次恐怖袭击深刻定义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底色,各个城市的地铁安检,机场愈发严格的安检,敏感场所的摄像头监控等等,其实或多或少都是缘于9·11所代表的全球恐怖主义的影响。

我觉得,文学艺术总是引领我们去打破文化身份的藩篱,但并不是说让我们变成同一类人,或是有共同思想的人。所谓“命运共同体”,就是危机时代的产物,它基于人类共同面临风险挑战这样一个共识。如果说9·

11有什么积极影响的话,那就是它形塑了一种意识与观念,即:每个人,在面对极端暴力时都是同等的脆弱。我们无论肤色、国籍、性别、族裔或阶级,都是肉身凡胎,大家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好的9·11小说在文学层面深刻地诠释什么叫“命运共同体”,让读者从狭隘的信息茧房中跳出来,看到人类所遭遇的共同的伤害、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绝望。基于这个公约数,我们启程去寻找希望。

公共阅读与批评,需要更多学科的参与

读品:近几年你频频受邀参加新书推广活动,是什么促使你愿意由一个书斋中的学者向公共领域的阅读推广者转变?

但汉松:这跟我的学术兴趣其实是一致的。我把自己在这些阅读沙龙上的亮相,当成阿伦特所说的“行动”,其目标是建构一个更良善的公共阅读空间。学术也好,知识也好,应该有它的公共性,而文学的公共性尤其重要。文学阅读应该打破专业读者的小圈层,扩大到公共领域,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是好的文学阅读。文学批评不能只是为了评职称或知识生产,去写一些阳春白雪的学术论文。我很珍视这样的公共参与。

读品:现在有一种偏见,那就是似乎只有做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才是批评家,做外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不是批评家,他们更多的被视为外国文学研究者。

但汉松:这个可能和1949年后外语学科的定位有关系。我们曾经受到苏联那种外语教育方式的影响,把外语专业更多地变成了一种语言技能的培养。相比于文学院或中文系,外语专业作为人文学科的地位更弱一些。老师们对自己的定位,更倾向于在书斋里进行知识生产,而不是做个面向公共空间的批评家。批评家和学者其实不一样,前者对于社会如何构建良善的生活,往往是有鲜明的态度,并且愿意去走出书斋,采取行动。当然,现在也有不少外语专业的学者正在打破这样的区隔,包括我的一些同事(法语系的黄钰老师、德语系的软文老师、西语系的张伟老师)也都经常出现在书店的读书活动中。

读品:你出版过书评集《以读攻读》,但现在的书评更多时候成了新书发行的软文广告;参与好书评选的,则以从事现代文学批评的专家为主。你对中国当下的书评写作、书评文化怎么看?

但汉松:阅读圈、书评圈如果总是以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来主导的话,确实容易出现风格的单一化。国外的书评市场似乎更加成熟一些,你很少看见那种从头夸到尾的书评,甚至会有激烈的批评文章刊登在《纽约客》《纽约书评》《伦敦书评》这样的大报大刊上。我觉得文学批评的多元化,才能有助于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的健康发展。让更多其他学科,包括外语专业出身的文化评论者进入到公共阅读与批评的视野中来,注入更多的声音,带来更多样的批评风格和范式,有望打破这样那种“熟人社会”所形成的同质化批评。

文学快销品破坏了文学阅读复杂的审美体验

读品:在知识付费时代,阅读变得唾手可得,有很多App以邀请一些名人将文学经典浓缩为数十分钟的音频。你觉得这样的产品有助于阅读吗?

但汉松:这类产品前几年确实很火,我在喜马拉雅也录过节目,领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了不起的盖茨比》,但现在大浪淘沙,存活下来的可能只是少数。它当然有好的一面,对公共阅读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因为它更符合当代人们信息获取的习惯。但不好的一面在于,这类产品往往有极强的变现压力,商业取向过浓。比如讲经典名著,套路规定得很死——开头的1000字要讲什么?2000~3000字要讲什么?最后500字要讲什么?一本书讲下来,规定要给用户提炼多少条“干货”。商品模式要标准化,当然无可厚非,但文学一旦过于标准化,就丧失了文学阅读应有的味道。就像你看了“三分钟讲一部电影”之类的短视频,再去接触这部电影,乐趣就大打折扣。文学快销品,以文学阅读为名,最后可能无助于培养出好的阅读习惯,甚至破坏了文学阅读应有的那种节奏缓慢、热爱复杂的审美体验。

读品:你翻译了品钦、朱利安·巴恩斯等人的作品,即便在业内人士看来,品钦也太难翻了。你为什么愿意投入精力做这样一件耗时耗力的事情?我们知道翻译也跟写书评文章一样,在学院评价体系里面是没有太多回报的事情。

但汉松:文学翻译有点像饭圈文化,你是谁的铁粉,就特别有冲动去翻译谁。我们做文学研究,对那些伟大的作家,往往会投入很深的个人情感,仿佛觉得他们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于是你不能容忍这么好的一个译本,却没有好的中译本。通过翻译,我可以逐字逐句地与这些文本耳鬓厮磨,与作家建立一种远超过一般读者的亲密性。这里,有一点点虚荣心在作祟,但也有一种很质朴的文化使命感。当然,功利地来看,文学翻译是费力不讨好的,翻译的稿费是很低,但为了追“星”,我们这些“私生饭”就愿意去做。

读品:你在微博有50万粉丝,也是深受南大学生喜爱的青年老师。有没有开设一些课程推广文学阅读呢?

但汉松:我开的跟文学阅读关系最密切的专业选修课,是“英美小说研究”,开了差不多10年了,学生反响还不错。每学期我会讲13~14个作家,有的是长篇小说的选段,有的是短篇小说,会有一个轮换名单,像简·奥斯丁、亨利·詹姆斯、梅尔维尔、海明威、福克纳这些作家是常读的,也会有意识地读一些现代当代的女作家,比如奥康纳、尤多拉·韦尔蒂。南大的选课制度是相当自由的,所以这门课的学生构成很多元的,文学院、新闻学院、商学院,甚至理工科的同学都有。

南大学生自己成立了一个“DIY悦读社”,由学生挑选他们感兴趣的老师,让老师单独设计课程。我为他们开过两次课,一次讲的是9·11文学,还有一次讲“审美与政治”,涉及贾樟柯的电影、布莱希特的戏剧、后印象派的绘画等等。在学校里,我们可以开设这种文史哲打通的实验性课程,这对培养大学生更丰富多元的人文阅读视野颇有帮助。所以,我也特别享受自己的教书生活,因为总是围绕着文学阅读,面对的是那些好奇心旺盛的年轻读者。